

歷 輯 溫 註 劉 斯 翰 審 訂

張九齡詩文選

廣東人民出版社



粤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李达强

封面设计:智 达

张九龄诗文选

罗 稻 选注

刘斯翰 审订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韶关日报社电脑部排版

韶关二九〇研究所地图彩印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30,000 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ISBN7—218—01548—4/I·186

定价:平装 9.90 元 精装 19.9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岭南文库顾问

(按姓氏笔划为序)

叶选平 卢钟鹤 任仲夷 杨应彬 杨资元
李兰芳 陈越平 林 若 黄文俞 黄华华
谢 非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黄 浩

主 编：于幼军

副 主 编：刘斯奋 岑 桑（执行） 萧如川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于幼军	卞恩才	冯伯秋	庄 昭
刘扳盛	刘斯奋	朱仲南	李权时
岑 桑	张 磊	陈俊年	陈胜彝
洪志军	胡守为	饶芃子	梁 钊
萧如川	曾牧野	曾宪志	廖晓勉
颜泽贤			

“岭南文库”前言

广东一隅，史称岭南。岭南文化，源远流长。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在中华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千百年来，为华夏文明的历史长卷增添了绚丽多彩、凝重深厚的篇章。

进入 19 世纪的南粤，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摇篮和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启蒙之地，继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和根据地。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斗争中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用鲜血写下了无数彪炳千秋的史诗。业绩煌煌，理当镌刻青史、流芳久远。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摧枯拉朽，奋发图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卓有建树。当中国社会跨进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全新的历史阶段，广东作为国

家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省区，被置于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发展的前沿，沿改革、开放、探索之路突飞猛进；历十年艰辛，轰轰烈烈，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空前伟绩。岭南大地，勃勃生机，繁花争簇，硕果累累。

际此历史嬗变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尤其是广东人民，有必要进一步认识岭南、研究岭南、回顾岭南的风云变幻，探寻岭南的历史走向，从而更有利于建设岭南。我们编辑出版“岭南文库”的目的，就在于予学人以展示其研究成果之园地，并帮助广大读者系统地了解岭南的历史文化，认识其过去和现在，从而激发爱国爱乡的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高瞻远瞩，继往开来。

“岭南文库”涵盖有关岭南（广东以及与广东在历史上、地理上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岭南地域）的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和人物传记等方面。并从历代有关岭南之名著中选择若干为读者所需的典籍，编校注释，选粹重印。个别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译著，亦在选辑之列。

“岭南文库”书目为350种左右，计划在五至七年内将主要门类的重点书目基本出齐，以后陆续补充，使之逐渐成为一套较为齐全的地域性百科文库，并作为一份有价值的文化积累，在祖国文化宝库中占一席之地。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元旦

序

为了给罗韬君的这个选注本作序，把张九龄诗重新浏览一遍。较之十年前注《曲江集》，现在的印象大不相同。

我在那时的印象，觉得曲江诗一是形式太保守，几乎清一色的五言古诗体，而且多用骈句，未脱六朝旧制，这在陈子昂倡导汉魏风骨之后，更见保守得可以；二是内容太单调，除少数应制、唱和之作，主要是咏怀，而所咏又概不离乎仕与隐、忠与孝不能两全的矛盾心境，虽云“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读得多了，总难免单调之感。如果说这是九龄诗之所短，也可以，不必讳言。我对这个“第一印象”，至今并无否定的意思。

我说的“印象大不相同”，不是指这种理性分析，而是感觉。是指以情绪为主的感受，此日和当时很不相同。本来，我是抱着“驾轻就熟”的态度来随意翻翻的，不料却蓦地觉得心弦一颤，触动甚深；咏味之余，悠然心往！这使我甚为诧异，于是想到，大概是年事的推移之力，步入中年，使我渐与诗人接近。现在我

终于能够理解他了，理解他为诗人的怀不能已，理解他做诗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匠心。

在古典诗歌的领域中，自来有“陶写性情”一派。属于这一派的诗人，并不以诗人自命，或者竟可以说，他们是“以诗为馀事”的。诗歌创作，纯为抒发个人的感触，既非流传当世以邀名誉，亦非颉颃古人以较高下。这一派诗人中，因为技巧不高，不能写得情出，不为世人所重视，以致寂寂无闻者，无疑很多。但却有极少数天分高、蕴深积厚的人物，以其绝俗之姿、超乎功利之概，使后人为之心折。前有陶渊明、王绩，以至曲江，都是这种人物。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作为历史人物，张九龄只是政治家，不是诗人。因为就其及身而言，尽管拥有位居宰辅那样的显赫地位，他却从未以诗名世；他自己虽然喜欢以做诗来排闷遣兴，却没有“抛心力作诗人”之想。要说，九龄原是以文章见称的，当时文坛领袖之一的张说褒扬他为“后来词人称首”，乃是指其文章，受到唐玄宗看重，许为“有王佐之才”的也是其文章。至于后世他的诗名完全掩盖了文名，那可是他自己和当时人意料之外的事了。

作为政治家，九龄的生平际遇其实相当幸运。首先，在他之前，还没有哪一个岭南人能够不阶尺土，由白衣而官致辅相的，所谓“千古江南第一人”，他乃是破天荒的人物。他的仕途虽非一帆风顺，其间也有升沉进退，却并无大起大落，从应玄宗试策高第授左拾遗，直至卒赠荆州大都督谥文献公，玄宗对他可称得上是“天恩浩荡”。其次，他的仕宦适逢开元盛世，玄宗的昏昧才刚露端倪，唐朝的国势正如日方中，即使极个别明智之士，已经察觉隐伏在花团锦簇之下的危机，也想象不到接

踵而来就是个地陷天崩的悲剧结局。可以说，九龄当的还是个太平宰相。因此，他没有也不可能有关于国家、社会危机的浩茫思虑，没有也不可能有关乎个人不幸的深痛巨创。我们竟可以说，九龄若是一个中庸通达的人，除写些歌功颂德、粉饰升平的诗，恐怕就再不会留下什么了。

完全是因为天生的诗人气质和耿介孤高的性格，使九龄的诗没有被高官的大礼服所笼盖，使得《曲江集》中，留下了一批与富贵无缘的“穷乡相之诗”（袭用欧阳修评范仲淹《渔家傲》语）。据我看，九龄做诗，只是因为“怀不能已”。他本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远离亲故置身于孤根无托、履险不测的官场，更加重了内心的矛盾和重荷；他又是一个直性狭中的人，不能对人世间的种种挫折淡然置之。由于性与诗近，他早年即受汉魏六朝诗的浸染，有甚深的根基。正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以诗来宣泄情怀，遂尔成为他无可取代的最佳选择了。

事实上，在《曲江集》中，只要不是为了应酬，他的诗便常常流泻着一个人的情感，坦露着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在今天看来，我们或许要嫌这感情太迂，嫌这内心世界不够丰富，但是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这内心世界是真实的，这感情别有动人之处，承认九龄之作为诗人，特具一种魅力。我们不妨试看看这些诗：

寒露洁秋空，遥山纷在瞩。孤顶乍修耸，微云复相续。人兹赏地偏，鸟亦爱林旭。结念凭幽远，抚躬局羁束。仰霄谢逸翰，临路嗟疲足。徂岁方睽携，归心亟踟躅。休闲倘有素，岂负南山曲！（《晨坐斋中偶而成咏》）

迢夜人何在？澄潭月里行。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外物寂无扰，中流淡自清。念归林叶换，愁坐露华生。犹

有汀洲鹤，霄分乍一鸣。（《西江夜行》）

理棹虽云远，饮冰宁有惜？况乃佳山川，怡然傲潭石。
奇峰发前转，茂树隈中积。猿鸟声自呼，风泉气相激。目
因谗容逆，心与清晖涤。纷吾谬执简，行郡将移檄。即事
聊独欢，素怀岂兼适。悠悠咏靡盬，庶以穷日夕。（《巡按
自漓水南行》）

这几首诗，正如前面所说，抒发的无非仕与隐、忠与孝不能两全的矛盾心境。可是，当诗人或晨坐斋中，或夜行江上，或白日出巡，因于各各不同的自然景物而起兴，而写情，却令我们感受到“俯仰自怜”、“深愁远念”、“克己奉公”这样不尽相同的情绪，与他一起流连于山光水色兴象难穷的境界。没有超卓的诗人气质，没有甚深的诗艺素养，要写出这样清深醇正、雅丽高明的作品，谈何容易！

九龄的诗，无疑地受到陶渊明甚深的影响。这从上举的几首诗就可明白见出。其实，他们两人都抱着仕与隐不能两全的大苦恼，并且借做诗以图解脱。所不同者，陶潜是处于江湖之远，而九龄则居于庙堂之高。但九龄又毕竟是九龄，与渊明的近于庄骚意趣不同，他的精神是近乎风雅。渊明于出仕志在济世，九龄出仕则意存忠君，渊明归隐志在放浪形骸，九龄于归隐却不忘尽孝。一句话，渊明近道，九龄近儒。平心而论，在“陶写性情”一派中，他们两人各自都达到很高的境界，至于世论殊不尔，那是因为种种原因，其中包括“穷而后工”的审美心理定势那样的原因，其复杂程度，非区区此序所能讨论，就不辩说了。

说九龄有甚深的诗艺修养，或者说他对于汉魏六朝诗有广泛的浸染和独特的了悟。这也是浏览《曲江集》所能感会的。

他的写景，得晋人山水诗之神韵，而佳句乃有过之，如：“暝色生前浦，清晖发近山”、“空水秋弥净，林烟晚更浓”、“孤顶乍修耸，微云复相续”、“猿鸟声自呼，风泉气相激”等等，不胜枚举；他的叙事述情，似得于谢康乐为多，既富条理而又委婉曲尽，虽兼之以情景相生、叙议杂出的种种变化，却总能舒卷自如，令人叹赏，如《商洛山行怀古》、《南阳道中作》、《酬王履震游园林见贻》、《奉使自蓝田玉山南行》、《洪州西山祈雨是日辄应因赋诗言事》、《郡内闲斋》、《荆州作二首》等，均是此中佳构。九龄一方面既善运骈偶，见齐梁以下之精严，一方面又以汉魏风骨振起之，一洗其卑弱绮靡之态，以致使人读其诗往往忘其骈偶，但觉古调之典质，复含今体之雕润，非古非今，妙不可言。九龄诗又长于比兴，其《感遇十二首》妙绝时人，子昂以后，堪称独步，固足为比兴之代表作，而九龄用比兴又远不止此。在《曲江集》中，比兴竟至达到了无诗无之的程度，而且一篇之中或于前、或于中、或于末，屡屡而有，不限一处而已。将比兴作为如此重要的艺术手段，在古今诗人中都是不多见的，它成为曲江诗的一大审美特色，使曲江诗的意境具有含蕴深微、味外有味的旨趣。

总而言之，九龄诗乃是魏晋隋唐的诗歌发展线索上，由前者向后者过渡阶段的代表人物之一。明胡震亨尝言：“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大雅之源，张子寿（九龄）首创清淡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以风神者也。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孟云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气骨者也。”（《唐音癸签》）即把九龄与公认开盛唐风气的陈子昂相提并论。其后，沈德潜、刘熙载、施补华等亦相继以陈、张并提，作为盛唐诗风的先导。

胡氏可谓独具只眼。二公相较，子昂力倡建安风骨，固使一代才人猛醒于六朝之颓靡，根本原因却在于建安时代慷慨任世的进取精神，与盛唐日益高涨的庶族地主参政的要求桴鼓相应。故子昂诗主要地是指向时代精神的向前一面。至于九龄，他本无所倡导，作为“陶写性情”一派的诗人，他只是以其本真人格和审美趣尚，默默地做自己的诗，而全然没有去考虑对当代诗人的影响。至其衣被王、孟等人的“清淡”，本上承晋宋齐梁山水诗脉，仅因其审美趣味，得以排宕六朝尘俗，挺出于盛唐之前，如此而已。与子昂迥然不同，他诗的精神是指向与时代精神背驰的一面。据我看，九龄之为诗人，洵可谓如闲云孤鹤，风流自赏。但是，正以此故，九龄诗于无意中又划出了一个分界，这就是：晋宋以还，五言古诗尤其山水诗中，那种“固当于尘外置赏”（胡震亨评九龄语）的境界，在《曲江集》以后，便不复可见了。盛唐诸公无复曲江之高古，他们亦无意为曲江之高古，盖二者所走的是全然不同的道路。因之，九龄的影响在有唐一代远远不如子昂煊赫，后世更难免向声背实，识者寥寥了。一千三百年中，《曲江集》迄无注本，亦可见一斑。

80年代初，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曲江集》，收入“广东地方文献丛书”中。今90年代伊始，岭南文库编辑部又决定把《张九龄诗文选》列入其宝库之中。这不仅可令世人知道九龄诗在岭南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而且更可引起九龄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应有地位的新的反思，其重要意义是可以断言的。本书的编选，已经将九龄诗文的佳制名篇全部纳入，虽不能说绝无遗珠，作为选本而言，却可以说已无遗憾。注者所做的题解、疏释和注，能够从时代背景、作者生平、思想感情和艺术技巧、

字词典故等方面，给予读者了解九龄诗文以较好的帮助，对于我的《曲江集》注本，确使人有“后出转精”之感，凡此都是值得肯定的。想到读者诸君阅读之后，当不易吾言，我就不欲一再饶舌了。

刘斯翰

1993年4月14日于童轩

前 言

在隋唐以前，岭南文化一直冥冥忽忽，到了公元677—678年这短短两年之间，就在曲江这个小县里，终以一儒一佛的两大标识，以一入世一出世的形式隆然而起，开始展出岭南文化的宏大历史场面：高僧惠能在这里弘法宝林寺，开顿悟法门；后来的唐相张九龄于此蒿降人世。尽管这两位同是河北范阳的后裔，一个被目为“岭南獬獒”、一个自称“岭海孤贱”，他们在宗教文化史上，或在政治史、文学史上都留下了重彩浓墨的一笔，其间的意义都远远超出了岭南的范围。

惠能不立文字。张九龄为后世留下了193题222首诗、248篇文；一部《曲江集》，就像张岱所说的“笼戏法锦”一样，包裹住张九龄几十年的心路历程。至今每一打开，使千载之下，仍能聆其声吻，会其心意，知其行藏，见其风度。在选注这本诗文集时，每每有一种与古人悲欢与共的温情，诵其诗，读其文，并与史传相参，真可以曲尽幽微而尚友其人。

从《浈阳峡》的少作，我们看到一个英俊少年那

种自信矫桀、揽辔自许的襟度；到《请诛安禄山疏》的盛年之文，我们看到一个政治家睿谟于朝的锐识卓见；再到《荆州卧病有怀始兴林泉》的暮年诗篇，我们看到一个孤臣鸟倦思还的落寞心境。这其间连缀的丝丝缕缕，有多少风云变幻、多少悲欣交集。九龄的一生丰富多采而曲折坎坷。他十三岁已在广州以文才崭露头角，二十多岁时为流寓岭南的文学家、政治家沈佺期、张说所激赏，廿九岁赴长安应试，中材堪经邦科登第，从此开始了仕宦生涯。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左拾遗、中书舍人等京职。四十九岁时出为洪州刺史。五十四岁还京任秘书少监，二年后被擢为中书令，成为初唐的最后一位贤相。后被李林甫所谗，出贬荆州长史。六十三岁南归展墓时，终于狐死首丘，病逝于韶州曲江故居。

九龄一生以儒学立身，致君尧舜、济世有为，是他的基本志向。尽管他初以文章见称，但其经济之材实有不可磨灭处。玄宗当初对他曾有“王佐之才”的推许。他于开元四年主持开凿大庾岭新路工程，是至今犹备受后人颂述的业绩。新路对进一步开发岭南，活跃江淮经济，充实长安府库都起了极大作用，对沟通岭南与内地，中国与海外的关系亦至关重要，是一项功在当时、泽及后世的伟业。他在行政方面亦每能从大处着眼。如规劝宰相姚崇“远谄躁，进纯厚”的《上姚令公书》就是一篇被收入《资治通鉴》的论政名文。他在《上封事书》中，把重视刺史、县令，改良地方吏治提高到极高地位来看待；在宰相任上，设置十道采访使，令加强地方官吏的考察成为制度。他最为后世崇仰的是他那“直气贯词，有死无贰；彰善惩恶，见义不回”的精神。张说一生对他奖掖尤多，既以“后来词人之冠”许之，复“以族子待之”，但九龄对这位恩师仍然爱之以德。如他

对张说在泰山封禅之际把亲信连升数级进入五品官之列，即以“官爵者天下之公器也”以规谏之。他对玄宗相李林甫、牛仙客都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对李林甫尤有“恐异日为社稷忧矣”的卓绝预见。《请诛安禄山疏》至今读来犹能闻见其掷地有声的铮铮气概。九龄这些预见之确当都一一为日后所证实。而他的这些意见都是犯颜直陈的，每次都引起玄宗的怫然变色、反词讥讽。九龄终于被摒出朝枢，流放荆州。自九龄被贬，唐朝的乱阶渐形，终而酿成令朝廷蒙尘播越的“安史之乱”。中唐时，中书侍郎崔群与宪宗论曰：“人皆以安禄山反于天宝十四年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任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新唐书·崔群传》）可称的论。九龄当时其志不行、忠而见嫉的巨痛深创是可以想见的。在荆州时的那些或伊郁低徊，或向慕清虚的诗作，实在是他那痛苦灵魂的写照。

我们对九龄一生奉儒，到晚年有慕佛之心是很能理解的。九龄少居韶州，正当惠能于此卓锡弘法、从者如云之时。九龄对惠能之名、惠能之学一定有所知闻。但《曲江集》于此未留片言只语，可见少年九龄之志在兼济。后九龄入京，长期任京官，此时神秀一系之佛学盛行京师，从皇帝到大臣佞佛成风。九龄恩师张说颇喜禅悦，撰过不少佛碑，《唐玉泉寺大通（神秀）禅师碑》就是其中之一。九龄知友严挺之一生“归心释典”，神秀门徒《大智禅师碑铭并序》就是他结撰的。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的《六祖能禅师碑铭》就是九龄提携过的后辈王维受神会之托撰写的。张说、严挺之在政治上与九龄有“朋党”之目，但九龄在宗教信仰上却崖岸自守，与他们颇有区别。九龄四十九岁时因张说罢相牵连外放洪州，严挺之曾以佛老之说开导之，但被

九龄婉谢了(见《与严给事书》)。他仍不改儒者风范,他对现实政治还是充满期待。总之,尽管九龄不时有欲保清劭的山林之愿,但“邦有道,当出为苍生”的思想仍是其主流,(他的《贺论三教状》、《贺御注金刚经状》纯属应制文章,不足以成为其有力的思想证明)用世忠君是他大半生的信条。但到了罢相外放,忠而见弃,眼看朝廷为奸佞把持,玄宗日见昏庸,“事不可为”令九龄终于失望。这时,这位宦海归来的疲惫的老人几度来到神秀当年主持的玉泉寺,留下了向佛思想十分鲜明的诗章,寄托了他对神秀的追慕,对佛家真空假有说的服膺。一个入世的政治家,一生怀抱的是富国安民的志愿,但到头来却是志屈途穷,到了晚年惟以“焚香忏往昔,礼足誓来今”(《祠紫盖山经玉泉山寺》诗)来抚慰那受伤的心灵。佛教的教义成为他灵魂的麻醉剂。读到这里,总不禁掩卷愁生,结哀深心。这又岂独为九龄个人惜之呢!

最后,需要郑重说明的是,这个选注本系以刘斯翰先生校注的《曲江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为底本的,个别地方参酌《全唐文》本作了校订。选本力求较全面反映张九龄诗的成就、风格。九龄文学成就主要在诗,故选注本以诗为主;文则选录能反映九龄心态、政见的文赋。诗选了一百零一题,文选十六篇。诗按编年定次第,以便观其生平思想、艺术演进之迹;赋、序、书、表、疏则列在文选,为明眉目,以体裁分列。

刘斯翰先生为此书作了匡谬正误的审读并赐序,《岭南文库》的编辑先生为此书的出版辛勤劳动,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选注者

1993年12月1日

目 录

序.....	刘斯翰	1
前言.....		8

诗 选

浈阳峡.....		3
商洛山行怀古.....		5
奉使自蓝田玉山南行.....		8
自湘水南行		11
自始兴溪夜上赴岭		12
南阳道中作		14
送窦校书见钱得“云中辨江树”		17
折杨柳		18
巫山高		19
赋得自君之出矣		21
和崔黄门寓直夜听蝉之作		22
高斋闲望言怀		24
别乡人南还		26